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青年学者文库

何幹之傳

耿化敏 著



在时代语境中『红色教授』的
人生沉浮与学术枯荣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青年学者文库

何幹之傳

耿化敏 著



在时代语境中『红色教授』的
人生沉浮与学术枯荣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干之传/耿化敏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098-1672-1

I. ①何… II. ①耿… III. ①何干之(1906~1969)—传记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423 号

责任编辑:郭宏 李向前(特邀)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0

网址:www. dscbs.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70mm×240mm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22. 5

印数:1—1300 册

版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72-1

定价:39.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写在文库前面的话

杨凤城

青年是希望是未来，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象征甚或代名词。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领域一个部门，概莫能外，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设立于1956年，建系于1958年，正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关怀、提携和指导下，靠一批又一批有志于中共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青年学人，接力传递，后继有人，至今已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当然，还要继续走下去，并努力走得更好。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青年学者文库”，目的在于给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平台，以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特点、学术风貌，给他们继续于学海行舟以鼓励。文库作者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青年教师为主，兼及本系培养的优秀博士生、进入本系博士后流动站人员、与本系有着各种学术合作的青年学者等。文库入选著作主要包括四类：

首先是中共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专题研究。我们知道，历史是由事件、运动、人物的链条集结而成的。离开了事件、人物，历史也就空心化了，也就变成了枯燥无味的说教。当然，历史事件与人物多如牛毛，不可能被穷尽。我们只能设定一个有限的目标——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问题。这与时下流行的眼光向下、重视个案和微观研究并不矛盾，而是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我们并不反对中共历史研究应该眼界下沉、重视个案和微观研究，因为他们可以展示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展现历史的细节，人言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从而让历史更为丰满和动人。但是，我们这套丛书更鼓励重要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中共历史毕竟是政治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在厘清历史主脉和走向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鼓励的是在党史核心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上发言，我们寻求的是历史叙事和研究中所蕴含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细节上故事上。

中共历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它应该有更多的现实关怀，或者人们经常讲的“资政育人”功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丛书选题还包括了下述方向：一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研究，可简称为党建史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是全党上下极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共历史研究不能不关注党的建设。但是，有关党建的决策性研究、理论性探讨，并非中共党史研究所长，那么，如何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发挥自身优势，以达到关怀现实、资政育人的目的呢？显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程（包括理论与实践）作出有历史纵深的分析和解读正是中共历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深度解读，按照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对理论框架、重要观点、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演变发展轨迹，进行客观的清晰的描绘和分析，充分展示理论的来源与原初，读解与演绎，影响和制约因素等等，正是中共历史研究应该做出的贡献。理由很清楚，只有对中共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而避免浮在理论和文本的表层重复言说、了无兴味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即使从新中国成立（哪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也有几十年了。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学界也早就开始了，且成果颇丰。但是，留下的空间依然很大，特别是对中共历史研究领域著名开拓者和著名学者的研究、对党史学史中某方面内容的富有时代高度的学术审视尚大有耕耘之地。有鉴于此，本文库入选的著作中，中共党史学史的选题亦构成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胡陆军、黄曙明两位校友,没有他们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慷慨捐助、设立基金,便难有这套丛书的面世。另外,还要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支持与合作。

一套书总要有个序,说说来龙去脉,有个交代。是俗套,也是需要。出于此,拉拉杂杂,写了上面这些话,实在不能称作“序”,就算是写在文库前面的几句话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此与中共党史青年学者共勉!

2012年4月1日

序一

一代宗师 六家合璧

高 放*

一、凸显理论家、史学家、教育家风范

青年学者耿化敏博士送来他的专著《何干之传》，要我为之作序。我以昏花老眼，手拿放大镜，花上几天时间读完这部约20多万字的书稿，真是深为感动，深受教益，深有感触！

他在近3年中走访32位有关人士，查阅了有关历史档案以及书刊资料。他在刻苦掌握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分析，对何干之（1906—1969）波澜起伏、悲欢离合的一生作了完整的生动的素描，对何干之作为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的贡献，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这样才能对何干之在理论、史学和教育方面的成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析。作者还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勇气和精神，对于从延安整风以来历经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胡风事件、整风反右、整风反教条主义、反修正主义教学检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何干之的屡次批判，都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澄清了历史真实面目，纠正了以往错误结论，作出了切实公正说明，为何干之洗冤昭雪，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这样也更加凸显了何干之作为著名理论家、史学家

* 作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和教育家的风范。

作为理论家，本书指出，何干之早从1936年春第二次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即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出发，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他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理论观点，当今看来的确是具有前瞻性、洞彻性的远见卓识。例如，他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就提出“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除汉奸以外的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阵线，是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同时，他还提出中国要进行“持久性”抗战，批驳了“三日亡国论”、“五十年准备论”、“绝对服从首领说”等等谬论。他从1934年起就不断论证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等等。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1936年，何干之就明确认定：中国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它不是过去那种由市民阶层主导的国民党鼓吹的“召开国民会议”式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托派主张的英美式的民主革命，更不是中共党内“左”倾分子宣扬的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新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将由工农民众担当，是“工农民主主义”，这种“新的民主革命”是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特定发展阶段。仅从他于1934—1937年间所提出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抗战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和新式民主革命论这四个政治理论观点来看，就足以说明，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独立创见和卓越建树。他的这些政治理论观点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中个人独立研究、自由思考的成果，与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当时和随后在延安发表的观点不谋而合，或者惊人相似，有的甚至就是先见之明。大概正由于有这些创见，以及他于1937年到达陕北后的新著述，1939年时党中央本来拟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作为史学家，何干之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不采取分权制而建立集权制，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残留着许许多多自成小天地的公社”^①，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① 《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来集中统一管理，再加上“水利要设施、外敌要防御、贸易要管理、粮食要调节等等”^①多种原因造成的。1936年，何干之发表文章并且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二书，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根源在于农村公社的残余和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压制。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开始崩溃。正在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入侵，更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是“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进行“新式的民主革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历史观。1937年他应党中央调令从上海到延安后，30多年中一直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教研工作，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他的五本著作，即《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理论5个方面为中国现代史作了较为深入而深刻的探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材。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经过3次修订，累计印数达160余万册，还被译为英、俄、越南等国文字出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直写到1956年6月。总之，何干之的史学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

作为教育家，本书讲到何干之早年就怀有“教育救国”理想。1923年他才17岁多，正在广州读中学四年级，因其父在美国经营的油业公司破产，无力为之缴纳学费，只好辍学回到台山县老家谋职，在昌明小学当教员、校长两年多。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起点。同时，他刻苦自学，1926年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系，得到他堂伯父的资助。这时，他的志向是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台山县当中学校长和教师，培养众多学生以振兴中华。大学期间，他受到革命启蒙教育，积极参与了革命宣传活动。1928年在白

^① 《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37页。

色恐怖中，他被学校开除，只好回到台山，在县城育英中学教书兼教务长。1929年春，经亲戚资助，他东渡日本留学。有了当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的经历和体验，他更增强了终身从教的愿望。所以1937年夏天党中央要调他从上海到延安在陕北公学执教时，他是如愿以偿，乐于接受。本来1937年7月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上报南京国民政府拟创办一所陕北大学培养抗战建国高级人才。由于国民政府以已有陕西大学、无力拨款另办陕北大学为由，没有批准。这样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好自力更生，创办规模小一些的陕北公学，办几个月和一年制的大学速成班，加速培养抗战建国急需的干部。何干之于1937年11月1日参加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时，鲜明地提出“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观点。这表明他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首倡人，并开始在“陕公”教学中付诸实践。

从陕北公学，经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到全国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在共产党创办的这四所大学执教30年。他以“中国现代革命史”为主课，培养了几十万名学生。他从1947年起，在华北联大开始带研究生。我是1948年8月从晋冀鲁豫地区的北方大学合并到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时，被他选拔为他直接指导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组当研究生。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进北京城后，我又在他领导下担任学习助理员（即助教），先后得到他的很多教诲和帮助。在2006年纪念何干之百岁诞辰时，我写有《缅怀改变我人生志向的导师——何干之教授》（已收入《何干之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在中国人民大学更是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年轻教师。1956年，他和何思敬教授被高等教育部评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两位一级教授。从1937年到1966年近30年中，他通过讲坛和论著，不懈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他是名实相符的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育才遍神州。

从本书的叙述可以看出，何干之能成长为优秀的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自有其客观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中国现代社会自1921年中国共产



党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为促进并实现这个大变革而献身。主观条件是何干之本人天性聪颖，自幼勤奋好学，练就较好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底；他怀有强烈的爱国救国情怀，关切劳动人民疾苦；他从大学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信念和信心；他能够在党的领导下长期艰苦奋斗，持之以恒，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认真钻研历史与理论问题，笔耕不辍；他热爱树人的教育事业，安心艰苦的教学工作，几次谢绝改行，矢志当好“红色教授”。

二、蕴含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的身影

拜读全书之后，我深感何干之不仅是优秀的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是切实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政论家。

说到革命家，众人大多认为这是专指由官方在对某位有很高领导职务、有重大贡献的领导人的讣告或悼词中所确认的“革命家”。我认为，这是狭义的革命家，是高层次的革命家。就广义而言，革命家泛指终身以革命为职业，在革命需要的某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在西方文字中，“革命者”与“革命家”是同一个词，如英文为revolutionary，法文为révolutionnaire，德文为Revolutionär，俄文为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但是在东方文字中，革命者与革命家是有区别的两个词。“家”是比“者”更高一筹的专门家。古汉语中有“理家”、“治家”、“作家”词汇，专指治理某一行业有专长的高手，如理财家、治水家等。自唐朝起，“作家”单指文学上有成就的人。明朝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80年代，借用汉字翻译西文文字为“革命者”或“革命家”。到20世纪初，这两个词就被中国引用、移植到汉文中来。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把以革命活动为职业者称为“职业革命家”的说法。例如弗·恩格斯曾经称赞19世纪30年代参与德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卡尔·沙佩尔为“果断坚毅，时刻准备

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30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①。从俄国沙皇专制政府严厉统治的情况出发，列宁于1902—1903年特别强调要把工人政党建成为从中央核心到地方基层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他语重心长地说：“没有职业革命家，事情总是寸步难行。”^②按照恩格斯和列宁以上的说法，我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时期凡是自觉参加共产党，并且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为职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突出贡献的革命者都可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革命家或共产主义革命家。何干之自1926年（时年20岁）考进中山大学受到革命思想启蒙后，即立志投身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广东反动当局通缉，于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刻苦学习，并且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后，他很快在广州成立秘密团体“广州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担任书记，开展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34年，他又被广东反动派通缉，他径直跑到上海找共产党地下组织，5月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他成为切实的职业革命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党组织领导和分配。直至1969年11月突发心脏病逝世，他为党在文教战线努力奋斗35年，为人民革命事业、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说到思想家，它与思想者一样，在西方文字中也是同一个词。如英文为thinker，法文为penseur，德文为Denker，俄文为мыслитель。也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先用汉字把此词译为思想家或思想者，然后被引进、移植到汉文中来。在汉文中，思想者通指善于独立深沉思考的人，思想家比思想者更高一个层次，通指有较为系统高深思想见解者。思想家与理论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的思想家未必是理论家，因为他虽然深入思考一系列问题，但是并未进而由此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有的理论家未必是思想家，因为他虽然构建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但是它未必能够切实符合社会发展与大众利益的需要。凡是思想家兼理论家者，必定是他深沉思考的重大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4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正符合社会发展与大众利益的需要；同时他自己又能苦心钻研，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理论见解。何干之在20世纪30年代就显示出了思想家兼理论家的特色。他在193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这样坦诚直言：“中国社会的变革，赋予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我们应知道自己所负的任务重大，拿出最强的决心，来尽一丝一毫的努力。”“目前是我们思想家发挥能力的时代了。各派思想家应该拿出他们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解剖六年来民主要素中间的微妙关系，指示我们未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抓住现在，追求未来。”^①在当时思想家队伍中，何干之以身作则，率先深入探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发表多部论著，如上所述，提出了一系列独立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指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中国如何从1840年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要如何通过“新式的民主革命”过渡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等等。当时在上海那样的环境中，何干之能够自由独立思考，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问题，又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他自1937年到达延安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研究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就受到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盛行对领袖个人崇拜的环境中，他又屡次遭到错误的批判，因此就很难再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再发表什么独立见解了。

何干之还不愧为政论家，即政治评论家。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思想解放，洞察时事，偶有感悟，就奋笔疾书，针砭时弊，以唤起民众，提高认识。1928年，他自广州返回家乡台山，担任县城育英中学教师和《民国日报》编辑期间，在《台山日报》、《民国日报》、《劲风日报》和《南华报》发表大约10万字的社论和短评，倡导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主义，发展经济与教育，增进民主和民生。1931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又到台山活动。1932年春，他受聘担任《台山日报》总编辑，在报上发表大量社论和专论，更进一步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可以说他梅开二度，第二

①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次显示出政论家的风采。1933年,他进而联络友好在广州创办《世界情势》半月刊,他任主编,出版6期就被查禁;他不屈不挠,另编发《文化阵线》月刊,问世两期后又被禁杀。在这两种期刊上,他曾经编译、撰写多篇政论文稿。这一年4月,他就任“广州文总”书记后,又出版有《新路线》、《星光》等油印刊物。何干之在上述这些期刊上继续发表多篇短论。这是他从家乡台山进而转身到广州市第三次崭露出政论家的头角。1934年他在上海找到党并加入党之后,在党的领导下,他更加自觉地从事文化思想工作。从1934年至1937年他去延安前,在上海除了撰写6部学术论著外,还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稿,如《广田内阁论》、《关于国联的没落和复兴》、《中国的国际关系》等等。这是他第四次以政论家的姿态活跃在当时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市。自从他1937年夏天应党中央调令到延安后,他主要是在学校执教,政论文章就屈指可数,很少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就更 不写政论、时论的文稿了。我记得1957年5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骨干教师王淇曾经给他贴出大字报,提出善意意见,说他在理论界不像胡绳那样,更多关怀国事天下事,更多发表针对现实问题的文稿。造成这种情况,这自然有很多主客观原因。我以为从他个人来说,到延安后,特别是进北京城后,由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养尊处优,稍有疏懒,他不再像年轻在白区工作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艰苦奋斗,勤奋笔耕了,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

白璧微瑕,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总之,何干之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中国著名的一代宗师,他集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史学家、教育家、政论家于一身,六家合璧,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在他的同辈人之中也是稀有突出的。我们理应为之树碑立传。通过披读本书,正有益于我们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治学精神和教育精神,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

序末再填词一首述怀。



桃源忆故人（感念恩师）

宗师一代培桃李，矢志坚传真理，红色江山更美，赖有新人起。
终生革命教国史，历遇蹉跎不弛，舌鼓笔耕^①不辍，总探求不止。

2011年12月14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城内校区
张自忠路3号大院红楼寓所，2012年3月3日修订。

① 1937年10月底，毛泽东在接待何干之等到延安的上海文化界地下党著名人士时，曾经鼓励他们“用笔和口继续战斗”。何干之铭记在心，毕生奋斗。

推进中共史学家研究的努力

杨凤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无论是党史人物还是党史事件,抑或是重大的思潮、理论政策方针和历史现象,都有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仅就党史人物研究而言,不仅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推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等大型专门丛书,更有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为代表的一批人物传记力作。从学界的现状来看,当下的人物传记多以政治要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中共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宜应把参与中共历史书写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整体性地纳入研究范畴,因为只有具体考察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和学术业绩,才有可能深层地追寻20世纪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轨迹。

在中共史学史上,涌现出一些具有卓越建树的史学家,他们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近20年来,重写20世纪中国学术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大潮流,有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对于同一时代的中共党史学家的研究仍很滞后。如果说过去因为中共历史与现实政治

* 作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理事会会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



的距离太近,学术研究还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各种限制,那么现在可以说开展严肃客观的历史研究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这不仅指党史研究环境的开放,有关党史学家的史料得到整理出版,更重要的是党史学界关于“学术史”的问题意识空前增强。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关于胡乔木、胡绳、龚育之、胡华等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毋须讳言,仍存在很大的空白地带。

在党史学家群体中,何干之就是一位既不可绕开,又有待加强研究的历史人物。何干之是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他自1937年在陕北公学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党史教育,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30余年,写下300余万字的文稿,培养了大批中共党史教学与科研人才,为新中国高校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中共党史的教学体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队伍仍受到他的党史成果和党史思想的影响。换言之,何干之是回顾中共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标本”。

有鉴于此,青年学者耿化敏自2007年开始潜心为何干之写传。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作者4年劳动的成果。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何干之的人生经历和党史成就的学术专著。作者尽其所能地占有史料,不仅广泛搜集了各种公开文献,还查阅了一手档案,开展了大量访谈工作,使本书的写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还坚持历史主义的笔法,以传主的生平为主线,全面再现了何干之追求马克思主义,献身党史教育事业的人生历程,并在铺陈史实和寓论于史的结合中,重点刻画了若干重要的历史关节点,适当描述了传主各历史时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情感,从而使人物形象既丰满又生动。不仅如此,作者还尝试“以小见大”,把传主的个体史置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动中,力图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勾勒出中共党史学科早年的历史风貌,以利于知识分子工作和党史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这部著作肯定还有一些不足或改进之处,好在作者不但年轻而且有踏实虚心的学术品德,以后自可补其缺憾。